

# 我所知道的戴笠

沈 醉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K828/4

# 我所知道的戴笠

135402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1979年·北京

我所知道的戴笠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06印张150千字

1962年7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2次印刷

---

内部发行

定价 0.45 元

## 出 版 說 明

这里收集的两篇資料，原載第二十二、二十四期“文史資料选輯”。作者沈醉，十八岁就参加了戴笠所領導的特务組織，曾任軍統局总务处长、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等职。这两篇文章是他于一九六〇年被特赦釋放后写的。現編在一起供內部閱讀参考。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事实，均未經過查对，請讀者在引用时加以注意。

一九六二年六月

##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戴笠.....	( 1 )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 161 )
附录.....	( 223 )

## 我所知道的戴笠

軍統特务首脑戴笠，是蔣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蔣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他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貫政策：在为蔣介石排除異己、保卫反动政权，以及保护蔣介石的安全等方面，可以说用尽了他生平所有的力量。无怪他生前能得到蔣介石的格外垂青，寵爱备至；死后使蔣介石特別感得伤心，亲自一再为他选择墓地。主仆之間，关系之深，实非一般可比。

关于戴笠一生所作所为，我知道得不很多。虽然我从十八岁便参加了他所领导的特务組織，前后十多年中并在他身边担任总务处长四、五年之久，但由于他一貫阴險狡詐、变化多端、性情反复无常、使人不易捉摸，因此写述他的有关材料，不但遺漏必多，而且在他作風、性格等方面，也不能象其他人物一样易于掌握。他待人接物有几副不同面孔、不同方式和不同方法，往往使甲所見与乙所知不尽相同，甚至恰恰相反。为了真实保存一点有关他的資料，所以我在写述时，只就我过去所直接了解到的，和从种种傳聞中比較可靠的一部份写出来。对于軍統整个組織人事、罪惡活动、軍統所办的近八十多个特务訓練班的具体情况和数以千百計的軍

統所控制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詳細情形，以及軍統和戴笠怎样运用与防范叛徒等材料，准备另写，这里只把一些比較重要的关节扼要地叙述，以便把写述的重点集中到戴笠身上。

## 一 家庭情况

戴笠，字雨农，小名春風，一八九六年秋生于浙江省江山縣硤口鎮。幼年丧父。兄弟两人，弟名春霖。母为一个很能干、勤朴的农村妇女，善于操持家务。戴笠很少向人提到他父亲情况，却經常对人称赞他母亲如何能干。特别是我任軍統总务处长期間，他不下十余次向我談过他母亲在处理日常生活問題的种种經驗，要我向她学习。抗战前，戴笠在南京时，他母亲曾住在鸡鵝巷五十三号（他办公和会客的地方）进门左边平房內，我經常見到过她，性情溫和、慈祥。戴笠每次对勤杂兵拳足交加地毆打时，他母亲必出来制止，并撫慰被打的人。戴一向以孝順母亲来标榜自己，但是抗日战争发生后，却把母亲送回家乡，浙江淪陷前也沒有接出来。他又以此来标榜自己“为国而忘家”的精神。胜利后，他才回去看望过他的母亲。他自己虽然揮霍无度，但对母亲的用費却限制很严，生怕他母亲在家乡购置田产。为了表示自己清廉，曾一再叮囑不許背地里將軍統經費撥給他母亲。我去見他母亲时，她告訴我家里的錢常不够用，因为經常有些同乡和戴笠的旧部找她要錢，并且还要替戴笠养几匹馬，每月开支很大。直到戴笠死后，她还健在。由于她不識字，所以一直瞞着，而騙她說戴笠出国去了，她也信以为真。一九四九年初她才死去。

戴笠結婚很早。他元配毛氏，是江山小同鄉，也是一個朴實的農村婦女。她曾在南京雞鵝巷住過，對人很和藹，沒有什麼架子；與戴母一同和當時在雞鵝巷辦公的特務一桌吃飯。戴笠最初和她感情還好，以後便不大理她。不但不與她一同吃飯，甚至連辦公室都不准她進去。她也毫不在意，天天和戴笠的副官警衛一起生活。抗戰開始前和她婆婆一道送回家鄉，抗戰初期便死去了。

戴笠只有一個兒子叫戴藏宜，約生於一九一四年前後。這人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的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只讀過高中，便沒有再進學。戴笠對他用錢限制很嚴，他却想方設法憑着父親關係到處借錢用。他沒有出來做過什麼事，一直倚仗父親勢力，在家鄉無惡不作。他在家鄉辦一所小學，自任校長。對在該校工作的女性、甚至連自己親戚也要加以蹂躪。他相當怕他父親，戴笠常用雞毛撻子打他。他們父子間很少見面，也極少通信。戴笠在世時，特務們對他还客氣一點；戴笠死後，都對他冷淡起來。特別是在瓜分戴笠的財產時，他滿以為可以趁此機會大大撈一把，結果不但鄭介民、毛人鳳等同他發生衝突，連軍統南京辦事處長李人士也為了爭奪一部派克牌跑車幾乎把他扣押起來。當時戴笠的棺材還停在中山路靈堂，他跑去撫棺痛哭。最後只得把這輛汽車送還給李人士，由我另外給他找了一部別克牌跑車了事。

戴笠的弟弟戴春霖也是一個軍統特務，在蘭州等特訓班當過事務員。抗戰勝利後回家鄉，倚仗兄勢，在地方強占人民田地、房產、妻女，無惡不作，為一方惡霸。

抗戰開始，戴笠將母親妻子送回家鄉後，便在長沙找了



一个女秘书叫余素恒，一直带在身边。到重庆后送她进他在重庆所办的外事训练班，有意和她结婚。后又送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而把她的母亲弟妹等一起从长沙接到重庆军统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居住。戴对这位未曾公开的岳母很好，经常去探望。躲警报时，也特别指定在他专用的防空洞内。

余素恒在美国几年中，传闻她已另有对象，迟迟不想回国。而戴笠自一九四三年与老牌电影皇后胡蝶秘密同居以后，也渐渐忘记了余，落得她不回来，免得多惹麻烦。

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他自有了胡蝶以后，对于玩弄其他女性的兴趣也减少了一些，因为胡蝶很有一套笼络男人的手段。当时胡的挂名丈夫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自从老婆被戴笠看中而占有之后，他在美人与金钱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决定宁可牺牲老婆，而利用这个机会来发一笔横财。他知道不这样做，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手枪穿几个窟窿。当戴笠答应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名义，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生意时，他便长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庆去和老婆会面。抗战胜利后，戴笠还准备叫胡蝶正式和潘有声离婚而与他公开结婚。后来因为他从北平回上海时坐飞机摔死了，潘有声才带着胡蝶去香港当寓公。关于他同胡蝶的事，后面详作交代。

## 二 抗日战争以前的片断情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不会骑马，却很欢喜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象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几十条手

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貴之相”。別人当面說他举止和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馬行健，居然以馬自居。他常說願为蔣介石終身效犬馬之勞，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馬而引以为荣的。

在他沒有进黃埔之前，早就替蔣介石充当特务。他先是替胡宗南做情报，以后由胡推荐给蔣介石。他經常向人談到他过去充当无业流氓时在杭州所过的日子与在上海“打流”的情况。那时他只有一套衣服过夏天，穿髒了便在西湖內洗干净、晒在湖边，干了再穿起来。一双白帆布鞋每次花一个銅板的白粉塗上去，又象新的一样。他在上海住在老表張冠夫（張袞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嫂很讨厌他，常常閉門不納。以后他发迹了，張冠夫在軍統当會計室副主任，他便慫恿張討小老婆，以报往日之仇。他那位表嫂談起这段情况时，还很气忿。

他在未进黃埔前，到处搜集一些情报，但只能在蔣介石出門时拦住汽車递上一份报告。以后到黃埔軍校第六期混了一个时候，沒有毕业便当了蔣介石的副官和参謀，才慢慢接近起来。当时在蔣介石身边当秘书的胡靖安，据說还领导过他的工作，不过時間很短。以后他便和張炎元、黃雍、周偉龙、徐亮、馬策、胡天秋、郑錫麟、梁干乔、王天木等十人組成一伙，正式領有經費，从事特务活动。这便是以后軍統所称的“十人团”。这十个人不久又有些人离开了去干别的工作，如黃雍、馬策、郑錫麟等人。以后除黃雍未再回到軍統工作外，馬策和郑錫麟又都再度回到軍統，成为軍統中重要骨干分子。从“十人团”慢慢发展起来后，才成立軍事委员会

特务处。以后軍委会調查統計局成立，由陈立夫任局长，特务处改为第二处，戴笠任处长；第一处則为中央党部調查統計局的前身，由徐恩曾任处长。以后复兴社也成立特务处由戴笠兼任处长，实际上还是这个班底。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調查統計局成立，才把軍統交給戴笠。原来徐恩曾领导的第一处全部人員均到中央党部調查統計局去（簡称为中統）。原戴笠领导的第二处則扩充为四个处（即軍統）。由于戴笠資历不够任局长，蔣介石怕別人不服气，便指定他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軍統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負实际責任。

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特务处成立后，戴笠的特务系統才算正式形成。这时他便放手发展組織，扩充地盘。蔣介石只派郑介民当他的副处长和一个主管會計工作的徐人驥；其他的人員都是他自己慢慢找来的。所以他在軍統中向以家长自居，特务們都称他为“老板”。約在一九三四年前后，蔣介石手下另一特务头子邓文儀，因各方面工作都赶不上戴笠，蔣便命令邓将所领导的南昌行营調查科所屬特务系統全部并入戴笠特务系統內，并由戴笠兼南昌行营調查科科长。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戴虽然一身兼任数要职，而蔣介石却还是叫他做戴科长，便是这个原因。当时并入的邓系特务張毅夫等数十人，以后一直跟着戴笠工作。从此以后，戴笠漸漸把勢力插入許多公开特务机关，先后控制了南京的首都警察厅調查課，由赵世瑞任課长；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偵察大队也接收过来，由吳乃宪、翁光輝、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調查股也落入戴的手中，由翁光輝任股长。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署长也由戴笠推派吳乃宪担任。甚

至当时以禁鴉片为名，实际是公开壟断販运鴉片而筹措反共經費的禁烟督察处密查組，以及各地的一些警察局、偵緝队、各省保安处第四科（或称訓練科）也都相继被戴笠所控制。当时特务們称南京的特务处为“总处”。戴笠經常爱讲总处并入陈立夫领导的軍委会調查統計局改为第二处时，他去見陈，陈对他很为藐視，使他永久怀恨在心，多年不忘。以后軍統与中統一直鬧磨擦，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戴笠在扩大組織的同时，还先后在南京洪公祠以及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內开办特务訓練班。南京特訓班用的是參謀本部諜报參謀訓練班名义，由申听蟬当主任，专门找黄埔軍校各期毕业的失业学生，施以特务訓練后，交由他安排在軍統內工作。軍統一些特务头子如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澤、陈善周……等都是这个訓練班毕业的。戴笠是浙江警官学校特訓班的政治特派員，由他选調該校正科毕业生和調动一部分特务去受訓，以后成为軍統中骨干分子。毛森、楊超群、蕭勃、阮清源、邓墨村等都是这个班毕业的。不久，戴笠又利用康澤在庐山举办軍校庐山特訓班的机会，与康澤合作，在該班附設一个队，由連謀任队长，专为軍統訓練特务。

在这一阶段中，戴笠主要的活动是反共和为蔣介石排除異己。他利用一些叛徒如梁干乔、王新衡、謝力公、叶道信、余乐醒、陆海防、程一鳴等替他进行反共活动和訓練特务学生。而最为蔣介石所欣賞的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綁票的工作，如吉鴻昌被刺于天津国民飯店，張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飯店，都是由他領導的华北区行动組白式維、黃泗欽做的。特别是上海方面的活动，更为蔣介石所稱贊。宋庆齡副主席当

时虽然被国民党尊为国母，但实际上却对她仇恨万分。特别是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恰恰是針對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任意捕杀人民最有力量組織。蒋介石虽然多次想下她的毒手，恐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責，一直迟迟未敢下手，只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居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的前后进行監視，有时由特务們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副主席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为所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蔣活动。最后，蒋介石便决定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組長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間将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杏佛）打死在离宋住宅不远的馬斯南路，企图以此威吓宋副主席。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廑的同学和汽車司机打死在嘉兴附近。全車四人，仅史咏廑逃走未遇害。目的是用以威吓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行动組常在上海逮捕綁架中共人士，破坏中共組織。中共江苏省委王克全和不少中共黨員先后被捕。第三国际远东区負責人华尔敦（不明国籍、当时报上称之为怪西人案，因他被捕后一句話也不說）及其秘书陆海防，与有关人员程其英、陆独步、袁殊、王莹等被捕后均由戴亲自审訊，并以种种威胁利誘方法逼供。另外他还經常命令上海行动組在英法两租界內用綁票方法，秘密逮捕中共領導人員。当时英法租界內是不准反动政府任意进去逮捕居民的。但只要事前通知他們会同一道去搜捕共产党，即使是深更半夜，那些外国包探长都会特別表示欢迎，也随时答应准許“引渡”。由于要通过这一手續，而且公开以后，报上要登出消息不易繼續发展新的綫索，特别是帝国主义者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找出一些关系，所以戴笠非不得已，

不主張正式通过租界巡捕房去搜捕革命人士，而爰直接采取綁票办法，达到目的。因为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更有利些。約在一九三三年間，我記得有一次在法租界蒲柏路、呂班路口蒲柏坊准备綁架一位中共負責人，因內綫指錯了人，而誤將一个以賽馬为职业的騎馬师綁走，一直送到南京才发觉綁錯了。后来將錯就錯，錯了也一样囚禁起来不放，因为怕他放出来会洩漏秘密；一直糊里糊塗囚禁到抗战发生、南京撤退时才行釋放。还有一次是在英租界越界筑路的曹家渡附近去綁一位中共領導人，这人是住在英国人越出租界範圍所修筑在租界以外的一条馬路上。这位中共領導人在突然被特务綁架时，就从后門跑出去。这些人既是綁票匪，又是反动政府的正式特务，一看他跑出了租界势力範圍，便由綁票变成公开逮捕，竟开枪將其腿部击伤后捕去。象这类的政治綁票案件，在当时上海租界上是經常发生。戴笠为了在租界綁票和搜捕共产党更方便起見，便决定对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工作人員进行收买。我在軍統上海特区担任过法租界的組長。这个組的特务当中，有一个是法租界巡捕房华探长范广珍，便是收买后参加軍統的。以后戴笠还另派了一个他自己訓練过的特务、黄埔六期毕业的阮兆輝，通过范广珍的关系，和五百元的活动費而打入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以便进一步便于軍統在租界內的綁票活动。

当时軍統在上海綁架到的中共人士和进步人士，一般不在上海审訊，立刻解送到南京軍統的秘密監獄去囚禁和审訊。这个監獄的負責人是黄埔五期毕业的苏子鶴，化名顾人道。这是当时一所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監獄，專門囚禁共产党和政治犯。到一九三四年以后扩大成为两个，这时連軍統和

复兴社的違紀人員也同樣囚禁到这两所監獄內。連西安事变后，被蔣介石扣押的曾扩情，也由蔣介石交与戴笠囚禁过半年多。我在上海有五年多，經常解送被捕的革命人士和軍統違紀特务去南京，总是由苏子鶴、或特务队长許建业等到車站接我。我把人犯交給他們后，只能搭他們的便車到北門桥附近下車，从来也沒有去这些監獄看过。当时是非常严密，沒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是决不許知道这些監獄的地点和內部情况的。

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勁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領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要錢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专干綁票、暗杀工作。以后一些反蔣的进步人士和李济深、陈銘樞等便利用他这一組織，进行暗杀蔣介石的活动。先后在庐山和上海法租界发生过謀刺蔣介石而未中的事件，便是由他主持的。其中規模最大、布置最周密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在南京国民党第四屆六中全会开会时于中央党部內謀刺蔣介石未成而击伤汪精卫的事件，也是由王亚樵受了反蔣人士的委托而干出的。他們先在南京組織一个“晨光通訊社”，趁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以記者身份混入會場，手枪則放入照相机內（因为这样檢查时才容易混过）。那次照相时，蔣介石恰巧沒有参加。刺客孙凤鳴（晨光通訊社記者）便只好刺杀仅次于蔣介石的汪精卫。因为孙放在照相机內的是一支三号小左輪枪，洞穿力不大，所以只把汪精卫击伤而未毙命。刺客當場被張学良、張继等抱住摔倒在地，結果被汪精卫和蔣介石的卫士开枪當場击毙。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便抓着蔣介石大吵大鬧，认为毫无疑問一定是蔣介石派人干的；因为他事先知道，所以自己不出来照相。蔣介石受了一

頓冤枉之后，便找戴笠去大罵一場，限期叫他破案以洗清自己。戴便連夜进行搜捕，找出一条代孙凤鳴領取大会記者入場证的綫索，将当时在中央軍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他亲自刑訊后，立即带着这个人专车赶往上海，将在上海靜安寺路滄州飯店住的晨光通訊社編輯主任張裕华逮捕。中統局也找到了綫索，在丹阳县将采訪主任賀波光逮捕。只有社长华克之潜逃。我曾在华克之逃往上海后，临时住在英租界赫德路他寓所中守捕未获，只在他的許多文件中，发现他与艾思奇先生私人間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張裕华因跳窗逃走，被摔伤腿部，戴笠仍不放过而在病床边去逼供。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鳴的妻子捕获。他对这个女的用尽各种酷刑，甚至叫人用藤条抽打阴戶，和用小針刺奶头等办法逼供。結果又在香港将有关人員余立奎、胡大海等捕获，引渡到了南京归案。因这个案子內有一个是改組派的人，陈璧君和汪精卫才相信不是蔣介石派人干的。还有一九三〇年前后，有人在上海北火車站行刺宋子文未中，而击毙了他的亲信秘书唐腴庐。到一九三四年戴笠获得綫索将在逃多年的凶手和宋子文的司机从苏北高邮、泰兴两地捕回，一問也是王亚樵干的。福建事变失敗后，王亚樵曾托范汉杰向蔣介石說情，想投向国民党，蔣叫他同戴笠接洽。王当时看不起戴，便去投了桂系。戴感到此人不能除，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計想除此心腹大患。一直到抗战期間，他才通过特务陈质平和王亚樵的小老婆金石心勾結为內应，派人在广西梧州将王暗杀掉。

戴笠当时另一个对头是盘据在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和他所领导的新国民党。这场斗争也是相当激烈。他曾多次派



人到广州准备在陈济棠、胡汉民等寓所或道路上进行暗杀而未成功。最后他便派特务邢森洲去香港活动，而将陈认为最有实力可以与蒋介石相抗衡的一队空军收买过来，全部飞往南京，投向蒋介石，使得陈非常气沮。另外，戴对胡汉民手下最得力的帮手刘芦隐，也是随时要想置之于死地。一九三六年冬，刘芦隐从广州到上海，戴命令我设法绑了他送往南京，以便秘密处死。记得那天下着小雪，我带着几个特务驾着一辆汽车到处去找刘在上海的关系。后来发现刘的一个姓华的小老婆住在法租界具当路附近。我正开着车向西走去，突然发现刘和他小老婆乘着一辆草绿色的福特轿车从对面驶来。我立即调转头，紧紧跟在后面，但因为他的车子比较新、跑得快没有跟上，只记住了他的汽车号码。当晚我便开着车到处乱找，结果在三马路扬子饭店发现了他的汽车。我们守到半夜，刘和他小老婆才一道从旅馆走出来。我原打算利用他的汽车将他绑走，结果因为他小老婆发觉大叫起来，惊动附近的英国巡捕，才由秘密逮捕变成公开。结果一同到英租界老闸捕房，以后利用杨永泰在武汉被刺的机会，硬把这一罪名加在刘的身上，将刘引渡到武汉归案。戴笠对没有照他指示秘密逮捕成功而大发脾气，因为公开了以后便不好随便杀掉。

抗战前，戴笠对上海的工作很重视，经常由他亲自赶去指挥。当时上海特区有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这些情报组是专门搞搜集情报的活动，每组有十多人。虽然以地区关系略有分工，如南市、法租界、英租界、闸北（包括江湾吴淞口）各有一个组，而中心工作是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反蒋集团中去活动。当时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